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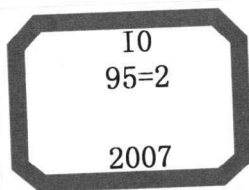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温儒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1469-8

I. 新… II. 温… III. 现实主义 -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081 号

书 名: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

著作责任者: 温儒敏 著

责任编辑: 张文定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469-8/I·08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8.75 印张 28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唯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

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再版自序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成稿于1987年,当年通过答辩后,即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重版,出版社的编辑问我是否要作些修订。回头看这篇少作,自然感到有不少肤浅之处,但我不想作什么改动了,它毕竟记录了自己曾经走过的学术途程,也带有那个时代思维的特点,还是保留它原来的面目吧。

想当初选择这个题目,也真是有些“大胆”。那时现实主义已经被人们谈得很腻,是个老旧的话题,但又很少有过学理性的探讨,甚至还没有一本系统的现实主义研究的专史,而我专门要拣这颗“酸果子”来啃,当然就有点“吃力不讨好”。记得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吴组缃先生就给我当头一炮,说现实主义问题纠缠太多,很难说得清。他是作家,写作也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主义”之类。弄得导师王瑶先生也有些“紧张”,我更是胆战心惊。担任答辩委员的还有樊骏、钱中文、吕德申等几位先生,好在“有惊无险”,诸位老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论文通过了,还给了较高的评价。回想起来,吴组缃先生的批评真是一语中的。不是这个题目不值得做,而是以我等能力,的确很难做好。论文出版后,虽然得到许多好评,引用率很高,被海内外一些大学指定为本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甚至还得过奖,但我心里越来越清楚,拙著其实还是有“做文章”的痕迹,毛病不少,之所以被重视,多少也是占了“出道”较早的便宜。不敢说这本小书已足于称“史”,它顶多只是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大概梳理了有关现实

主义思潮方面的资料,粗略地勾勒了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的轮廓,并试图初步总结其历史特征与得失经验。如果这些“清理地基”工作能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某些材料,或者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那就是笔者的安慰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乐于重版这部旧作。

现实主义是个包容性非常广的概念,从思潮、流派、创作方法或者其他各个角度,都可以介入“现实主义”。本书主要谈的是现代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虽然也必然会涉及文学社团、流派、创作、批评和论争等等,但都是从思潮角度去讨论。其实这是一种思潮史的研究,中心线索很明确,但涵盖的范围可能又比较宽。在本书初版的“小引”中我曾经提到,本书采取的办法是“史述”为主,从繁复的文学历史现象中选借一些最突出的“点”,去把握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三十多年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轨迹,考察它与其他思潮流派的关系,它所以成为“主潮”的原因,它对整个新文学所起的推进或者制约的作用,以及它在世界文学发展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写这本书时,我除了查阅大量史料,也尽量了解了中外关于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我不想预先命定所谓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但又确实有意在作一些中外的比较,看某些西方的或者东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形。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本书除了受到现当代文学领域学者的关注,也曾被看作是当时比较文学界的一项收获。

本书初版时有过一篇后记,这次再版删去了,但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还想抄录在这里,也是对于过去岁月的一种纪念吧:

北大中文系我们那一届博士研究生只有陈平原与我两人,平时不怎么上课,王瑶先生不时把我们找去他家里坐一坐,通常又还有一些教员和文学界的专家以及研究生在座。这就是“文学沙龙”罢。每回大致也有一个中心话题,可是

并不拘束,大家随便发表意见,交换文学研究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这就等于上课。在轻松的气氛中,先生总是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地“闲聊”。我的许多思路正是在这种“闲聊”中酝酿形成的。初稿出来后,王瑶先生又花了半个多月,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这本书得于通过答辩并出版,又使我有幸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恩师的扶掖是感铭不忘的。除了王瑶导师之外,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老师也曾给我许多指教,有些观点形成又曾与师兄钱理群、吴福辉等的讨论中受益。对于师友们真诚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我在此表示敬意。

当然还要感谢北大出版社,感谢本书初版时的责任编辑张文定先生,他们帮助这本书面世,还把它列入当时颇有影响的《北大青年学者文库》。我生命中值得忆念的美好的一部分,也就和这本书以及催促它诞生的师友们联系在一起了。

2006年5月8日于京西蓝旗营

小 引

又是“现实主义”！

看到这样的论题，或许多少会令人感到腻味。

这也难怪。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这个词是用得太滥了，几乎成了鉴别一切创作得失成败的“标尺”：你要评赞一部作品，就得证明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如果有哪一部作品被扣上“反现实主义”这顶帽子，差不多也就等于被判处了艺术生命的死刑。现实主义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现实主义就不成其为现实主义了。这种囊括一切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不能说明和解决任何文学问题，反而可能成为阻滞文学事业包括真正的现实主义发展的障碍。“弄丑”了的现实主义，当然免不了令人生厌。一旦现实主义被推到“独尊”乃至“君临”一切的地位，文学创作的活力必然被扼制，现实主义也就完全“异化”了、“变质”了。人们厌弃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以至谈到它都感到腻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文学冲破文化禁锢而重新获得正常发展的生机时，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重估与清理，就显得那样的迫切。

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人们曾经多么强烈地呼唤那久违了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五四”、鲁迅、“问题小说”……大家感到是那样的亲近。那牵动过亿万人民的心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正是追寻着“五四”现实主义的足迹而走过那一段光辉的历程的。

可是,才那么几年过去,而今许多作家、理论家却又在有意“冷淡”或偏离现实主义了。他们有时也谈“五四”,谈鲁迅……可是角度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更希望得到的,已经不止于现实主义,而是一个开放的、多姿多彩的创作天地。

这一切都应看做是正常的。

当人们听腻了那些虚情假意的空话文学,怎能不渴求以真实的审美的艺术来抒发与反映那久积胸中的沉郁呢?不是那贴近生活的热诚的现实主义作品,才最足以给久已枯涩的灵魂带来人性的抚慰吗?而随着开放时代的到来,人们渴求与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直接对话,并试图建构一个更能充分表现当代复杂的生活与情思的多元的文坛,那么对昔日现实主义“君临”天下的局面表示厌恶与否弃,也就无可非议了。对虚假现实主义普遍的腻味,对真诚现实主义普遍的渴求,对发展或超越现实主义普遍的希望……这种种“普遍”的心理衍化,终将作为“文学历史现象”,值得往后的文学史家们去研究。

我同样也曾经“腻味”、“渴求”与“希望超越”过,但更大的兴趣却已经从所体验过的“普遍”的文学心理引发到对历史的沉思上来了:我在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近乎戏剧性的历史命运。

既然大家感到“腻味”的其实是那种一度被“弄丑”了的、“君临”一切的“现实主义”,那么新文学现实主义本来的面目又是什么样呢?“五四”以来,西方各式文学思潮涌入中国,都发生过影响,为什么现实主义能占据主流,并左右了近七十年来的整个新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呢?新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有什么历史的联系?现实主义本身也有荣衰升降、曲折回环、到底如何把握其发展的态势与轮廓呢?如何将它置于同时态世界文学背景下去比较考察,它有哪些特点比较显明呢?也许该把现实主义看做一道不断综合创新的“流”,那么从不同时期的不同流变得失中,是否可以感悟出某些规律,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如果更细致一些,则还可以深入研究:现实主义所面对的某

些基本问题,如真实性、典型、历史感、文体、叙述模式、文艺与生活关系、文艺与政治关系,等等,都各自拥有怎样的“解释的历史”呢?怎样看待现实主义在今日所面临的现代主义的冲击呢?现实主义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说的已经“过时”或出现“危机”?……当我开始接触史料,追踪历史,思索这一大堆问题时,感到对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历史进行客观的整体的把握,确实比对它盲目地评赞或轻率地否定,都要繁难得多,甚至远不如从概念推理寻绎现实主义来得容易。

现实主义课题的重要性,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所铸定了的。当今无论持什么样的文学观点,追随哪一“派”、哪一种“理论”,都很难绕开现实主义不谈,都必须对现实主义传统“表态”。如果对新文学现实主义历史缺少完整的认识,就不可能扎稳当今文学发展的历史根基。看不到现实主义是不断地综合和创新,把传统作为当代的“信条”,甚至由此而留恋昔日“现实主义”“独尊”的虚荣,那固然是愚蠢的,行不通的;而以虚无主义偏激的情绪对待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向构想中的虚妄的历史挑战,到头来也如同堂吉珂德那样,只能收获虚妄。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们反传统其实是反对缠缚现时步履的传统“信条”,他们中间的优秀作家从不把传统本身当做一只破鞋,他们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大都有相当的“根基”。如果离开历史所提供给自己这一代人的现实条件,对传统没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却又笼统地“反传统”,那么能得到什么呢?也许只能在流沙上暂时垒起一座新奇的文学之塔。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对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看能否给现实主义这一老旧而又新鲜的话题,增添一点历史感。

这也许很难。对新文学现实主义清醒的科学的历史性总结,恐怕还需要再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只有当历史的灰尘纷纷落定,人们无须把过剩的感情召唤到历史研究的疆场中去的时

候,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完全清晰地显现出来。因此,我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在着手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史的难度。我大概还是只能先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

在这本书中,我将以“史述”为主,从繁复的文学历史现象中选借一些最突出的“点”(主要是一些代表性的文论、文学争辩、创作风气等),去把握“文学革命”后三十多年间(1917—1949)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发生、发展与流变的轨迹,考察它与其他思潮流派的关系,它所以成为新文学主流的原因,它对整个新文学所起的推进或制约作用,以及它在世界文学发展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

本书分四章,一至三章大致依现代文学(1917—1949)三个十年^①的顺序,对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与流变作史的概观,第四章从总体上探讨其得失与特色。

^① 通称“新文学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初至1927年底;第二个十年是1928年初至1937年7月;而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实际上有12年,也习惯称为第三个十年。

作者小传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全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文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教学。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8)、《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人合作,1998)、《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与人合作,2002)、《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2002)、《文学史的视野》(2003)、《高等语文》(与人合作,2003)、《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与人合作,2005)、《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2007)等。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1)
再版自序	(1)
小 引	(1)
第一章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1)
第一节 欧洲现实主义传入的历史条件	(3)
第二节 “进化论”目光下的“写实主义”	(7)
第三节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12)
第四节 “为人生”思潮对俄国文学的借重	(20)
第五节 “问题小说热”给初期现实主义 带来的利弊	(27)
第六节 “自然主义”的借用	(35)
第七节 现实主义者的初次困扰	(39)
第八节 从历时性看鲁迅对“五四”现实主义 的影响	(45)
第九节 “乡土文学派”与“人生派”的创作	(55)
第十节 新的写实取向	(71)
第二章 第二个十年(1928—1937)	(78)
第一节 “政治化”趋势中的两股创作潮流	(78)
第二节 “革命文学”论争引发对现实主义的 新思考	(86)
第三节 “新写实主义”的演变与得失	(98)
第四节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实际影响	(108)

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入	(120)
第六节	浪漫派、现代派向现实主义的归趋	(131)
第七节	注重社会剖析的创作风气	(135)
第八节	典型化的初步探索	(141)
第三章	第三个十年(1937—1949)	(147)
第一节	现实主义思潮的短暂停滞	(148)
第二节	关于“暴露与讽刺”的讨论	(150)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中两种现实主义 理论体系的酝酿	(155)
第四节	“寻根”:《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 现实主义文学新趋向	(162)
第五节	围绕“主观论”的论辩	(173)
第六节	现实主义的文体发展	(187)
第七节	追求史诗格调	(192)
第八节	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	(196)
第九节	民族化探求的不同路向	(199)
第四章	总体勾勒:特色与得失	(206)
第一节	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看 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	(206)
第二节	历史使命感	(213)
第三节	民族自省精神	(218)
第四节	写实性	(222)
第五节	偏向社会概括的典型化	(226)
第六节	对浪漫主义的兼容	(233)
第七节	“形式感”与独创意识	(237)
参考书目		(242)
附录 现实主义流变大事年表(1915—1949)		(244)
人名索引		(257)

第一章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现实主义”，这是最具有伸缩性，因而也用得最为混乱的一个文学批评术语。如约翰·詹普(John D. Jamp)在他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一书中所列举的“现实主义”分类，就多达三十多种。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或层次去为现实主义下各种定义，这就造成现实主义概念的歧义性。难怪有的批评家提醒人们讨论问题时，千万不要“陷进现实主义这个词的泥淖里”。^①看来，我们最好也别一开头就纠缠在现实主义的复杂的理论探讨上，这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既然要写现实主义流变史，还是先要给本书所要评述的现实主义“定位”，限定其基本内涵。

大致说来，现实主义可以看做是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神，或理解为一种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也有的用来指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如果把现实主义看做是创作精神与方法，那么可以说，它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也是源远流长的。以往有的论者就试图论说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在精神与方法上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如著名文学理论家冯雪峰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这篇论文中，探究“五四”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学的关联，就提出，从《诗经》和《离骚》开始的传统文学中，现实主义始终是“主潮”。其实冯雪峰所说的现实主义指的就是一种正视并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或“倾向”，涵括面是相当宽的；甚至

^① 见 W. J. Harrey, *The Art of George Eliot*, London, 1961, p. 50.

认为像李白这样的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精神的积极方面”,也可以“概括到现实主义之内去”。^① 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解释未免过于宽泛,多少还滑到现实主义“独尊论”边上去了;这种理解,在过去有相当的代表性。

而本书所要讨论的现实主义主要指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评述文学思潮自然也可能不时涉及创作精神或方法,这几方面是彼此有联系的。但谈“精神”或“方法”,最终仍是为了勾勒思潮的发展踪迹。作为一般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或方法,在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则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我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现代文化意识的一部分。它主要并非由古代文学的传统延伸发展而来,尽管不难寻出其间的某些历史联系;它基本上是在对外国文学横向吸收和改造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思潮,可以说是世界性现实主义思潮传入的结果。在 1920 年代,新文学现实主义主要接受了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包括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1930、1940 年代,又逐渐融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分。因此,本书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来考察时,除了理清其发展流变的历史线索,还将格外注重“影响研究”。

当然,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外来“移植”,“影响”的种子只有落在适宜的土壤上,并且得到适宜的气候,才能发芽生根,至于长成什么样,也还决定于它所赖以生长的土质与气候条件。归根到底,新文学作家是受“五四”后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制约,并立足于本土需要去认识、选择和改铸外来的现实主义理论思潮的。我们考察世界性的现实主义思潮如何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崛起,将特别注意它所经历的特殊道路、它的发展变形,以及它所形成的独特品格与得失。

^① 见《冯雪峰论文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78—529 页。